

# 中美对峙中，我们这种讨人嫌的骑墙派

作者：黄乔治

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狠狠批评了一群他称为“半反革命”的高等知识分子，并警告他们在革命大潮中不要再妄想骑墙：

“现在世界上局面，乃革命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争斗的局面。”毛写道，“那些中间阶级，在西洋如所谓第二国际等类，在中国如所谓国家主义派等类，必须赶快的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没有他们‘独立’的余地。”

时隔近百年，随着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的冰点，《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也发文，正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美对抗之下必须站队：

“精英们这个时候不能恋美国、怕美国，而要敢于站到与美国开展复杂博弈的一线，把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放在首位。”他写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是很多中国人需要重温这句话的时候了。”

我算不上知识分子，但看到这样逼着选边站的语言却不免毛骨悚然。和很多不问政治、只求安稳过日子的留美华人一样，我徒有的只是知识分子的怯懦，对舒适生活的向往，对公共议题仍未消退的关注，和对于站队的本能拒斥。但在中美对峙日趋激烈的大时代里，我们这样的骑墙派、逍遥派，又还能在夹缝之中逍遥多久？

从贸易战到媒体战到所谓“新冷战”，从针对华为到针对TikTok和微信，从绿卡的暂缓发放到留学生网课签证新规，从制裁军方背景高校到制裁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孔子学院，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的2020年对于许多在美国的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情感上还是实际生活中，都是紧张、焦虑和难上加难的一年。许多在美学习、生活和工作多年普通中国人因为留美签证受到影响而不得不回国发展，更多的人即使还没被赶出美国也在担忧自己的签证是否会得到延期，继而不敢在生活中作任何长久的打算。

对于我来说，近来一种“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的感觉愈发强烈，主要是因为在中美两边的朋友讨论政治话题时，都能明显感知到对方对“骑墙派”的敌意。

例如，我国内许多体制内工作的家人朋友常常批评我“斗争意识不强”，警告我不要学作家方方，在任何问题上，都不要在这种敌我斗争白热化的阶段去批评共产党，因为批评就是被认为在给美国人“递刀子”。不“递刀子”，就是要坚决肯定中国政府抗疫的成功，就是要坚决反对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坚决支持中国在新疆的“去极端化”政策，坚决拥护打破领导人任期制，坚决赞成中国政府对香港的全面管制，凡此种种。

另一方面，我不少在美国政府、媒体和智库工作的朋友们则越来越经常地要我表态：你难道不觉得中国共产党是邪恶的吗？特朗普有错，但如果不是中国隐瞒新冠疫情在先，美国会死那么多人吗？孔子学院



和中国领馆这种间谍窝点，关闭他们不是理所应当吗？

对于两边的这种问题，我都很难给他们不违心、又满意响亮的回答。而对于他们来说，我的回答可能也不重要了。随着美国决策层中对华强硬的共识逐渐成型，随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日渐高涨，两边都需要更多立场坚定斗志强的意识形态战士，而那些不是非黑即白的声音就越发讨人嫌。在美国的华人里就有不少像我这种讨人嫌的人。我们一方面认可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对特朗普政府这样“抽风式”的对华政策和美国正在蔓延的反华情绪感到万分沮丧。我们小心翼翼地试图两边都不得罪，却又因为这种小心翼翼地得罪了更多的人。

一方面，我们这群在美华人是直接受到中美新冷战冲击的群体。从美国国务卿蓬皮欧到国家安全助理奥布莱恩，美国政府上下最近的讲话似乎都在强调，美国现在的极端政策针对的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人民。但在这样举国规模的政策动员下，这样的区别其实

没有意义。因为政策动员就在于煽动大众的情绪来为自己的政策背书，而在民意沸腾之下，混杂着不少种族主义者的普通美国人没有能力和意愿去区分自己恨的是中国人还是共产党。而美国政府所谓打压中国间谍，打压中国商业盗窃的政策，落实到具体执法行动中，则很难不演变为对没有官方背景的中国学者、公司与其他人士的有罪推定。

例如我认识的不少中国记者朋友，即使不在中国官媒工作、意识形态上更亲美的人，他们记者签证的延期申请也还没得到批准，只能准备着离开美国。他们能理解，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记者的限制，是对中国政府限制美国媒体的报复。但他们却想不通，玩这种互相驱逐记者的游戏，对美国能有什么好处？毕竟《人民日报》记者写的美国新闻，对于中国了解美国并不重要。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写中国的新闻，对于美国了解中国十分重要。

(下接第B1版 →)